

时代、门第与人物

——读田余庆《东晋门阀政治》

元培学院 李灿辉 2200017799

前言

六朝冠冕，东晋最盛。滥觞于两汉兴起的经学世族的士族势力，在东晋的影响力达到了顶峰，一度出现了门阀士族凌驾于皇权之上的特殊政治形态——门阀政治。《东晋门阀政治》一书，简练详实，深入浅出地介绍了东晋门阀政治的产生、发展与终结，书中提出的“门阀政治是皇权政治的变态”，“严格的门阀政治只存在于东晋一朝”等观点，对中古政治史研究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一， 概述：东晋门阀政治概述和《东晋门阀政治》的写作背景和组织结构

直接促成东晋门阀政治基本格局的，是司马越和王衍主政时，遣司马睿和王导镇江左以济中州一事¹。在永嘉乱后，东晋在南北门阀支持下立于建康，出现“王与马，共天下”²的主弱臣强之势，嗣后长期保持了“祭则司马，政在士族”的态势。琅琊王氏失势后，颍川庾氏，谯国桓氏，陈郡谢氏，太原王氏相继主持国柄，但其权势与独立性日衰。与此同时，流民团体和郗鉴经营京口时创立的北府兵势力，在与北方的战争中迅速壮大，最后于孙恩、卢循乱后终结了东晋门阀政治。迨至南朝，士族门阀虽仍立于朝堂，却已沦为了皇权装点庙堂之饰物，不复昔日之权势。

《东晋门阀政治》的写作，其主要背景为当时日本学者提出的“六朝贵族论”³，即认为六朝期形成了一种异于皇权政治的贵族政治形态。田余庆先生在本书中，用详细论证回应了“六朝贵族论”⁴，发展了梁启超的“专制政治论”，认为门阀政治不过是皇权政治的“变

¹ 田余庆：《东晋门阀政治》，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第10-12页，后续引用此书时省略简称为“书”

² 《晋书·王敦传》

³ 川胜义雄：《六朝贵族制社会研究》

⁴ 作者认为“六朝贵族论”“用中国古史套用西欧历史框架，因而难于使历史上通下串，左右关联。”，而事实上“中国古史中始终是皇权至上，皇权专制制度是运转历史的枢纽。尽管朝代变了，制度的外观有异，甚至后来皇帝居位制度也被推倒了，但皇权统治思想和某些机制实际上是保存在社会躯体的骨髓里面，可以说形成历史的遗传基因。

态”，它源于皇权政治，亦必将归于皇权政治，且江左门阀政治的产生是历史的偶然⁵。进一步地，作者提出，即使是这种“门阀政治”，严格上也仅存在于东晋一朝。

本书作为一部研究东晋政治史的专著，以类似论文集的形式组织，分为七个专题和后论部分，七个专题分别以影响东晋历史发展的七个主要人物或门阀为出发点，沿着门阀政治产生，稳定，巩固，发展，衰落，消亡的历史脉络展开。

我认为，作者采取这种结构，原因大致是因为相比后世，门阀政治中，每一个主要的士族及人物的活动，对历史的发展影响更为显著。东晋政治之演变在复杂的平衡与斗争中进行，倘要分析东晋一朝内部的矛盾斗争，则多种矛盾都应涉及。倘以编年形式书写，则因人物关系繁杂，难以厘清矛盾的主体和发展逻辑；倘以纪传形式或“婚宦分析”模式，则又嫌太重个人影响而忽视时代大流。简而言之，活跃于东晋的历史舞台上的主角由小到大大致分为人物，门第，时代三个主体，不同于传统模式，本书选取了门第作为展开讨论的起点。

此外，本书很多章节最初以单篇论文发表，经整理汇成本书，仅为全书逻辑上的连贯完整做了一定删改，采取此形式，保留了其原汁原味和本来的逻辑，使本书既得以在专题上探微钩玄，又能够描摹全象。

二， 矛盾与平衡：《东晋门阀政治》的历史视角

《东晋门阀政治》一书的叙事视角脱离了传统的“婚宦模式”——门阀干政之形式，常通过婚姻，仕宦，学术三个途径，故传统研究从静态模式出发，依此探究士族维持其政治地位的方式，即为所谓的“婚宦模式”。本书脱此窠臼，采取动态分析方法，以贯穿东晋一朝的此起彼伏的多重矛盾为线索展开，更加清晰地展现了东晋百年间的政治演变与门阀政治的兴亡。下以数例为证，概览本书中揭示的推动东晋政治进程的数种矛盾。

（钟鑫整理：《田余庆谈门阀政治与皇权》，《东方早报·上海书评》2013年1月6日）”

⁵ 书第343页

1， 皇权与门阀的矛盾

皇权与相权、门阀之间的斗争，是贯穿东晋一朝的主线。终晋一朝，皇权谋求重掌国器，而士族亦追求其势力的生存与扩张，二者冲突不断。历代晋帝有为者皆试图分化、压制门阀势力，元帝用刁协，刘隗，明帝联郗鉴以制王敦，王敦亦两度犯上作乱，此后明帝、成帝用庾亮以制王氏，司马昱，何充用桓温抑庾氏。最终，孝武帝、司马道子君臣在对门阀的斗争中取得上风，门阀桓玄反扑失败后，东晋一朝紧随门阀政治之灭亡而灭亡。终晋一朝，皇权和士族不断斗争，但二者又互相支撑共存，一旦其平衡被破坏，轻则引发政权危机，重则使司马氏政权与门阀政治一同灭亡。

2， 中央与地方的斗争——荆扬矛盾

荆扬矛盾，为东晋一朝地缘政治斗争的主要形态。江左州府于门阀斗争中最重要的是分别代表中央势力和地方拥兵大族的扬荆二州。自元帝以来，王敦，陶侃，庾亮，桓温，桓玄，刘毅等，据上流以谋挑战中央，而掌中枢者则据扬州与之对峙。东晋其他诸大州郡皆参与这场斗争：徐州，会稽屯重兵，为扬州股肱，流民，北府诸将屯江北而窥建康；豫州，江州居荆扬之间，历东晋一朝为荆扬之争核心地带，二州归属，反映着上下游势力的此消彼长：陶侃死后，先是庾亮独领江、荆、豫三州刺史，虽出为外官，却能扼建康朝廷与王导之咽喉，对朝政成遥控之势。王导，庾亮死后，诸大族核心人物相继占有江州。江州之归属，几成上下游强弱之晴雨表。

3， 原有与外来政治势力的矛盾

东晋一朝舞台上重要的政治势力，不只皇权和士族两家。次等士族和流民帅，亦发挥着重要的影响。

流民帅、次等士族与当权侨姓士族的界限，于南渡之前本不十分明显。南渡后的高门大

族，虽然常自夸先世之隆，然而南迁前往往往并非北方顶级大宗⁶。高门士族与次等士族之分野，大多来源于南渡时的机缘巧合。北来的流民帅，亦常有一定社会地位——例如郗鉴，即兼有流民帅和门阀人物的双重身份，而身为次等士族的卢循，杨佺期，则是北方高门之后。流民帅与次等士族参与政治，主要是通过操纵兵权：东晋为了防御北方民族，先有征发流民，后有建北府兵之举。于东晋政局中，流民和次等士族势力起初与晋廷保持若即若离的关系以求自保，同时直接或间接地参与门阀间的博弈：先有流民帅助扬以平王敦之乱，又有苏峻、祖约之乱，危及建康；日后则后来居上、逐渐走上历史舞台中央——北府刘牢之之倒戈，导致了王恭的兵败身死⁷，而次等士族孙恩和北府将刘裕，更是直接成为了东晋政权的掘墓人。

4， 门阀之间的矛盾

门阀之间矛盾的性质，更像是纯粹的权力斗争，这一矛盾在东晋诸矛盾中烈度最高，持续最久，相关史料也最清晰丰富，史家多有研究，本书简明地勾勒出了其中脉络：门阀政治的稳定与生机，正源于诸门阀间的相互制衡，这种生机以晋初王，庾，陶，郗诸势力并存时最盛；桓温死后谢安，王坦之，桓冲之间政治平衡的形成，亦使门阀政治得以继续维持数十年。而门阀政治本身的内在矛盾决定着这种平衡的不稳定：诸门阀士族皆欲扩张其政治势力，而力量的此消彼长必然带来不稳定与冲突：王敦，桓温，桓玄实力过强，觊觎皇权，终于引发动乱，破坏了门阀政治的根基。此情形于门阀政治生机尚存时还可补救，于桓玄之时，则终于带来了门阀政治与东晋王朝的共同覆灭。

三， 探微钩玄：严谨的治史态度

在鞭辟入里、富有创见性的观点以外，本书的学术价值同样体现在其治史态度上。本书内容大多是从搜集整理的史料中，分析历史细节，探讨具体问题。这种考证梳理，迥异

⁶ 书第 316-318 页

⁷ 书第 270 页

于《廿二史考异》、《十七史商榷》之类。作者分析史料，多用顺藤摸瓜之法，见微知著，从史家春秋笔法中探寻冰山下的玄机。本书大量考证之目的，一在支持其主要论点，二在使史论回归史实，避免沦为单纯的假想。魏晋门阀林立，史料观点莫衷一是，历代史论亦多偏颇，故此考证之精神，尤为重要。以下试举数例言之：

1，元帝、明帝朝晋胡关系问题

古人论晋胡关系，多赞晋代倡北伐，“不与刘、石通使”之气节⁸，其中常有借古讽今之意，先入为主，自多偏颇。作者分析此问题时，跳出这种“民族大义”史观，论述了其不得不然之故：其一，江左政权继承于东海王司马越，本就友鲜卑而敌匈奴，司马睿政权的对外政策保持着对前朝的延续性；其二，刘石势力内部矛盾严重，不暇南顾，求和并无必要性；其三，与刘、石通使本非易事，且胡汉矛盾本身即是东晋政权合法性和支持者的来源之一，故不通使之举，于民族气节外，本就有更实际的为政权利益的考量。作者又举例江左政权阻挠北伐，消极防御之举⁹，同样证明了当轴者只想苟安江左，对收复北方并无多少热情。

作者论此问题，本意并非驳斥古人。不与刘、石通使，本系外交问题，但其中深刻反映着晋初局势的复杂性，东晋之性质已变为地方政权，以及其建立发端于前朝等一系列学术洞见。

2，桓氏先籍问题

本书第四章用近半篇幅考证桓温的先世。桓氏世籍存在隐匿，历代修史者皆知，但六朝历任当权者篡改先世，附会高门名士的事情司空见惯，南朝时的江东土豪“冒袭良家，即成冠族”¹⁰，不为史家所怪，桓氏遮隐先世，亦非奇事。但作者认为，桓温所属的谯国

⁸ 袁燮《絮斋集》，王应麟《困学纪闻》

⁹ 书第35页

¹⁰ 《梁书武帝纪上》

桓氏，并非“孤微发迹”，桓玄称帝，不设祖庙有悖常理，古人只道桓玄行止乖悖，不合人伦，作者却试图发其隐情。作者先考证其已有的族谱，利用姓氏进行联想，大胆推测桓温先世桓楷乃桓范同族，尽管桓楷、桓范之具体关系难于推敲¹¹。此后，又引用郡治更易的史料，提出龙亢桓氏与谯国桓氏本为一家的猜测¹²，进而提出了桓温匿先世以讳桓范的观点。这一观点虽源自诸多大胆的假说，但亦有其合理之处。作者提出这一假说，并非为桓氏“正家谱”，而是为作为东晋执政门阀之来源之典例，亦为桓温何以迅速崛起，谋求权力扩张甚至有代晋之野心，以至打破了门阀、皇权之间的平衡，加速了东晋门阀政治的灭亡等问题提供了可能的答案。

3, 《世说新语》等史料的扬弃

本书用典旁征博引，不拘一格，既参考《晋书》、《通鉴》等官编正史，又多引《世说新语》，《太平御览》甚至《搜神记》等杂类书籍，《世说》之言，本非记史，《搜神》之说，更不足信。但为弥补直接史料之匮乏，从此类书籍中，亦能寻找历史的蛛丝马迹。如笔者先前所言，东晋一朝人治特色明显，人物言行，多干政事。如果以《世说》之言为本展开研究，未免荒谬，但若从以时人言语，揣度世人评价，显现社会中存在的基本矛盾的角度看，《世说》之类书籍亦有重要史料价值。作者用典不拘一格，能做到弃其虚构而扬其内涵，富于联想而能守严谨，这种治史态度，当为此书体现的学术价值之一重要组成。

四， 本书的若干缺憾

本书中存在数个令笔者不解的细节问题或笔者自认为的缺憾，现将个人愚见，罗列于下，如有谬误，祈望指正。

1, 参考资料提供不足

门阀政治的特殊性笔者前文已经提及，东晋门阀政治的演变中，地缘因素和宗族婚宦关

¹¹ 书第 135,138 页

¹² 书第 142-145 页

系因素影响颇大，传统研究多聚焦于此，本书主体虽跳出这一桎梏，但于具体问题之探究，亦难逃此类因素。晋代主要人物关系复杂混乱，地理行政划分亦不同于后世（例如著名的侨州郡县问题），书中倘能简要列出，既不至带来太多冗余，又能大大方便读者之阅读。笔者以为此处之缺省为本书一大瑕疵。

2， 忠奸史观

由于我国历代史论之积习，史家论史评人时常受忠奸史观之影响。例如，郗鉴势力在门阀间辗转腾挪，维护平衡，且时常支持弱势的皇室一方，作者因其保卫皇权之努力而对郗鉴多溢美之词¹³，笔者则认为个中主因，是郗鉴的流民势力，本无与王庾逐鹿的实力，门阀之平衡对郗鉴有利，他自然愿意奋力维持局面；而作者提到试图恢复皇权的孝武帝，司马道子君臣时，虽承认了其客观上恢复皇权之努力，却仍然简单地称之为“昏君乱臣”¹⁴，笔者以为，此定性在内容上本无必要，反而有主观性过重，影响本书之严谨态度之嫌。

3， 关于近亲通婚问题

作者在谈论晋末人物时，提到近亲通婚问题，未经详细考证即以此作为人才凋零的一大因素¹⁵。笔者觉得此论稍显武断，晋末的确缺乏晋初王导，郗鉴，祖逖一样的匡扶社稷之大才，但个中缘由，或者更当归因于士族群体的固化，旧有士族中的精英人物于晋中后期相互残杀，最后唯庸碌苟且之辈得以存留等原因更显合理。门阀内部通婚，自东汉已有，门阀士族自我隔离，不事生产的问题也并非于晋代最严重。东晋立国不过百年，中期尚有不少新发士族，次等士族与高门通婚，高门崛起，亦有先后，从生物学的角度，很难认为近亲通婚之论断站得住脚。此论可能来自类比欧洲皇室血统问题的研究，

¹³ 书第 99 页

¹⁴ 书第 259 页

¹⁵ 书第 253 页

但笔者认为，若要给出有说服力的论点，还需要更多的证据。

本书是作者多年治史智慧的结晶，本书中独树一帜的晋史分析视角，石破天惊的猜想，鞭辟入里的论断和深入史籍字里行间的探微钩玄，使本书受到了一致的高度评价。其中凝聚的作者的敢于质疑，大胆猜测，不懈探究，严谨考证的学术精神，更为历史学习和爱好者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